

「三趟快車」寄深情(上)

「三趟快車」是從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起，滿載着家禽、牲畜等鮮活生活物資，每天從鄭州、武漢、上海開往香港的三列重點列車。六十年過去了，我這老年逾「古稀」的「老鐵路」仍記憶猶新，親歷親為，見證了那一段難忘的歷史……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內地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人們日常生活十分困難，糧、油、肉、蛋等生活必需品十分匱乏，不得不採取憑票計劃供應。香港同胞的生活物資長期以來主要依靠內地供應。「大河沒水小河乾」，內地商品緊缺固然會影響到香港同胞的正常生活。一九六二年初，黨中央、國務院作出決定，外貿部門與鐵路系統聯手，從華中、華南和華東等不同地區組織貨源，每天向香港分別開行三趟貨物特別快車，為香港同胞送去鮮活的生活物資。從鄭州北站編發開行的供港鮮活物資列車為755次，武漢江岸西站編發的供港鮮活物資列車為751次，都要走京廣線進入香港。從上海編發的753次列車，則是經由其他線路進港，滿載着雞、鴨、

鵝、魚、牛、羊、豬等鮮活物資入港，盡最大努力滿足香港同胞的生活需求。一九六八年我從鐵路技術學校畢業來到武漢江岸機務段，是蒸汽機車上一名司爐工，通俗講就是在火車頭上燒鍋爐。每天牽引列車風裏來雨裏去，渾身又是汗又是灰地奔馳在京廣線上。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京廣線還沒有完全實現雙線行車，復線改造工程正在緊張地進行着。我們開車行駛途中，經常在沿線小站停車會讓列車。我在江岸機務段工作了五年，趕上拉751次和755次這兩趟進港列車是常有的事。有時中途小站停車時間較長，我們也會與跟車的押運員在一起聊天拉拉家常，了解到他們在行車途中與家禽、牲畜和水產品為伍同行的一些事。

那是一九六九年夏天。一天，我們駕駛着「FD」型1631號蒸汽機車在江岸西站，掛上從鄭州開來的755次列車。我把火燒得旺旺的，正點出發一路南下到了中伙鋪小站。因會議前方來車，我們停車了。機車上有大火爐烤着特別熱，我們師徒三人便下車就近找個地方涼快。車上兩個押運員看我們下車了，知道這趟車一時半會兒開不了，也下車和我們聊了起來。他倆張口是地道的河南話，我和司機師傅都是河南長大，自



然很有親切感，一下子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其中一個押運員有四十來歲，說他倆家都是漯河的，押了幾年活豬、活牛經由深圳入港，壺裏的開水都喝光了，說能否給點水路上喝？我趕忙答道：「車上有，我去把壺掂下來。」說着我就起身下車，把大壺裏的開水都倒進他們的水壺裏，不知道這點水能撐多久？大熱天，渴了比餓了都難受。餓了能忍，渴了嗓子眼兒都冒火似的，難受極了。我們聊了大約有二十來分鐘，了解到幹他們這一行的辛苦與不易。快要開車了，我們各上各的車繼續向前駛去。

我在武漢工作五年的時間裏，一年到頭拉751次和755次列車不計其數，從押運員和車站運輸一線人員那裏，了解到不少有關「三趟快車」開行的故事，聽起來令人動容。現在看起來都不是什麼大事、難事，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為了這「三趟快車」開行，不知道牽動了多少人的心！

外貿部門全力以赴組織貨源。俗話說，萬事開頭難。各地外貿部門都設有專人，深入到鄉鎮農村，收購雞鴨鵝魚和牛羊豬等有生命的物種。這些都是當年緊俏的生活必需品，組織貨源不容易，他們天天不知催促多少遍、跑多少

◀三月二日，在深圳平湖南國家物流樞紐，首趟「中央援港 同心抗疫」鐵路援港班列整裝待發。

路才能完成收購計劃。然後，再把這些活蹦亂跳的家禽和牲畜集中起來，按時一車車地運到各個車站，等待裝車發運。全程每一個環節不能有半點兒閃失，否則，完不成任務是要承擔責任的。外貿部門的人員幾十年如一日，為保證供港鮮活物資的列車正常開行，說不清付出了多少心血與汗水。改革開放之後，各地基礎設施建設有了很大改善，僅河南十個供港活豬基地縣，就有一百多個現代化的養豬場，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優質活豬，從這裏源源不斷地運往香港，成了香港同胞餐桌上的美味佳餚。

讓世界看見「打不死的香港」

最近從媒體報道中看到多具裝着遺體的屍袋塞滿病房，病人與屍同眠的相片，令人心寒！為何淪落至此？救死扶傷的醫院竟如此不尊重生命。儘管醫管局對此已公開道歉，但單是一句道歉並不能把事情抹走，醫管局應該要向公眾解釋清楚造成這樣慘不忍睹場面的原因。

疫症死亡人數大增，殮房爆滿並非藉口，總不能相信醫院沒有更好的安排。此事疑發生於伊利沙伯醫院，伊院是九龍中的龍頭醫院，地方很大，總有空間可騰出用作臨時短暫放置這些遺體。

那些相片令我看到都不安，何況躺在病床上的病人？為何當時負責處理那些遺體的醫護人員，沒有關顧過周圍病人的感受？病人置身於多具屍體中，肯定會很驚恐，擔心自己會否是下一個被「打包」的。

當一個病人離世，正常程序是替亡者作死後料理，包括最後全身清潔，然後更換衣服。若病人家屬有準備亡者生前的衣服，可交給護士替亡者穿上，否則會換上乾淨的病人袍，之後才把遺體包裹。最後把亡者資料記錄在掛牌上，掛牌上以不同

清心直說

楊美儀

顏色去識別普通病或具傳染性疾病。接着會致電支援組的大偈，來把遺體移送到殮房，這時任務才算完成。

前文提到「與屍同眠」的場景，我相信原因之一是大偈太忙，未能及時移走遺體。雖然搬動遺體不是護士的工作範圍，但在疫情嚴峻的情況下，醫院各部門的員工應互相支援，救死扶傷的地方最需要團隊精神，作為醫護人員要以保護病人和逝者為依歸。

如果及時把遺體移到附近其他空間，就不會出現這個對病人難受、對亡者不敬的畫面，試想社會大眾看到這些相片後，又怎能相信住院病人可得到醫護的悉心照顧？

第五波疫情前的一個多月，我出入伊院無數次探望住院的父親。我看到個別醫護對病人缺乏人性方面的照顧。醫護的關懷是病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為人送暖是不用計入醫療成本的。

疫情擴散已令香港經濟重挫，人心惶惶。隨着醫療危機不斷逼近，沒有任何因素可凌駕於生命和人情精神之上。我們要團結一致，守望相助，挽救生命，要讓世界看見「打不死的香港」。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俄烏戰爭爆發前夕，基輔一家電視台發生一宗親俄反俄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的事件，一名親俄的反對黨議員參加一個叫做「言論自由」的直播節目，因為拒絕譴責普京，被指為「俄羅斯間諜」，一名在場的烏克蘭記者更怒不可遏衝上朝他臉上重擊一拳，再使出鎖喉功，用手勾住這名親俄議員的頸部，其他嘉賓急忙上前勸架。幾天之後，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對烏克蘭採取「特別軍事行動」，戰事至今已持續二十多天。

當然，這件事與俄烏戰爭沒有任何直接關係。筆者想說的是，其時烏克蘭國內如一個火藥桶，任何與俄羅斯有關的話題都可能成為火花，但當時大多數人不認為戰爭迫在眉睫。在此之前，美國已公開宣稱掌握普京攻烏情報，並且率先從烏克蘭撤走外交人員和僑民，但總統澤連斯基不相信，基輔當局還埋怨西方國家撤僑的做法引起民眾恐慌。顯然，澤連斯基低估了戰爭的威脅，更遑論盡最大努力避免戰爭發生。當俄羅斯大軍殺到，兵圍基輔，澤連斯基又不斷埋怨美國和北約不肯出兵，不願在烏克蘭設立禁飛區。

烏克蘭原野已變成戰場，白楊樹葉飄落地上。在電視和網絡視頻看到戰火紛飛、生靈塗炭的血腥場面，看到成千上萬烏克蘭人扶老攜幼逃避戰火淪為難民，真是令人心碎。國際社會當務之急是促使雙方立即停火，避免釀成更大規模的人道主義災難。最近中國在聯合國等國際舞台上積極發聲，楊潔篪主任與沙利文會面、王毅國務委員與法、德外長召開視頻會議，中國一再呼籲俄烏停火和談，與此同時，中國紅十字會提供救援物資已運抵烏克蘭，中國的立場體現了負責任大國角色，而美國和盟友對俄羅斯的制裁明顯於事無補。

近日外電報道澤連斯基表示：很明顯，烏克蘭不是北約成員，我們理解這一點，我

祈禱和平，珍惜和平



▲俄烏戰爭仍在持續。

資料圖片

們是理性的人。多年來，我們被告知所謂「大門敞開」，但現在也聽說我們不能進入，這就是事實，這需要被承認。這只能讓人感嘆一句，烏克蘭人被美國和北約欺騙了太久，明白得太晚，付出的代價太大。

說到理性，對一個小國尤為重要。烏克蘭國土面積是歐洲第二大，人口有四千多萬，但夾在美國為首的北約和俄羅斯之間，就是一個小國。理論上大國小國平等，但國際政治除了理論，更講現實，政治現實的基礎是實力，大國政治縱橫捭闔，弱國小國的生存之道更需要理性和智慧，包括妥協的智慧。當日希臘陷入債務危機向歐元區大國求救，德法等國開出救亡條件包括希臘必須上交部分財政自主權，如果當時希臘政府和民眾堅持原則不願妥協，不僅會被踢出歐元區，甚至國家可能已經破產。

夾在大國中間的小國是否一定要選邊站？其實不然，歐洲有芬蘭為例，正視地緣政治現實，以妥協換取國泰民安，雖然近日民意支持烏克蘭抗俄，但芬蘭政府態度審慎。亞洲有新加坡和韓國，面對中美兩強角力而保持靈活性。中韓建交以來，青瓦台換了多任主人，無論來自哪一個黨派，都是右手擁抱美韓同盟，左手擁抱中韓經貿。烏克蘭如果能夠跳出親俄親美二選一的政治困

局，以理性和靈活手法處理與俄羅斯和美國及北約的關係，完全有條件可令國民過上好日子。最新消息指俄烏談判在烏克蘭中立問題上取得進展，希望俄烏早日結束這場沒有贏家的戰爭。

無論這場戰爭何時結束，結局如何，俄烏之戰已對由二戰後和冷戰後形成的國際秩序與世界格局造成極大衝擊。美國及其盟友與俄羅斯的關係已陷入新冷戰。在歐洲，部分前東歐陣營的國家和從前蘇聯獨立國家更加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法德曾經提倡建立歐盟軍隊前景渺茫。二戰戰敗國日本和德國有跡象趁機增加軍費、提升軍力。在經濟上，逆全球化不斷抬頭，G20的角色也面臨挑戰。俄烏戰爭對全球環境造成難以評估的災難性後果，近年世界各國為減排所做的努力隨時付諸東流。至於舉步維艱的中美關係，也因為「台獨」勢力借俄烏戰爭大肆炒作「大陸威脅論」、美國對「一個中國」立場講一套做一套而難有起色。總之，俄烏戰爭已成為新舊國際秩序的分水嶺。

遙望戰火中的烏克蘭，我們普通老百姓又能做什麼？筆者覺得，除了祈禱和平，還要更加珍惜和平，我們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時代，在這個大時代，享受和平並非理所當然。

懷念迹孀

一位一百零一歲長者日前辭世，她生前的後輩與學生紛紛以訊息相告。葉玲，是她的中國名字，許多朋友已忘記她的籍貫姓氏。消息互告時，報社老同事說：「迹孀走了！」而她的學生日文互通：「葉さん在醫院去世的。」

「迹孀」是報社同事對葉玲的暱稱，她原名佐藤園江，故鄉在九州，家境普通，由於戰爭，南渡台灣生活，在那裏邂逅丈夫陳迹。迹孀家族戰後在千葉縣定居，家中有一兄一姊。改革開放後迹孀與家鄉人有聯繫。

陳迹是畫家、攝影家，先是《大公報》編輯，後轉至《新晚報》任新聞攝影，主編周刊《良夜》。他有許多故事，例如一九三八年參加「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成為香港會員，會址在半山堅道十三號，會員還有著名木刻家李樺、賴少其、江豐，參與抗日救國。

大約一九六五年間，培僑中學開設日文課程，凡中六同學可報名，葉玲受聘為老師。去年是她百歲高壽，一位「關愛葉玲」的群組成



▲七十年代的葉玲。作者供圖

員談起日文老師，說同學稱她為「中日人民友好使者」，擬為她寫書出版，我即表支持，願意作力所能及的贊助。葉玲當年教授的幾屆畢業生，分布美加、內地與香港，各有所成，建立了「關愛葉玲」群組以感恩。他們十年前知道老師陷於困境，合資把她送入北角英皇道一家養老院，直至日前辭世，葉玲生前的生活費用，由這批學生承擔。

「中日人民友好使者」這一美譽，使我想起當年往事。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外貿受西方

制裁，中日尚沒有外交關係，每年春秋二季的「廣交會」，中日貿易依靠民間進行，日商參會佔總數三分之一。我每隔一屆往廣州採訪，有一次在會場偶遇葉玲，喜見熟人，交談中她介紹身邊的日本商人。

六十年代的香港，工業初興，外貿蓬勃，國家駐港機構華潤、中旅、中資銀行等對日經貿活動增加，但發現缺乏日語人才，因此趕急培訓，四處打聽，覓識了葉玲這位日籍女士任教。當時除了培僑教學，她再騰出空隙為國家駐港機構的人員上課，迅速培養了一批外貿及金融的日語人才，還為學生留學日本提供指導與幫助。

葉玲做了中國媳婦，日本是她想念的家，有一次她拋開事務返鄉，這已是許多年前了。報社同事知道陳迹生性浪漫，時有出人意表事發生。他與葉玲的姻緣發生在台灣。葉玲成長於台灣，二戰結束後，陳迹到台灣採訪，兩人偶遇，情投意合，她隨他來到生疏的香

港，組織家庭，生下一女一男，幾十年風雨同路。一九六七年陳迹任記者，隨時可能遇上莫須有的事失去自由，縱使環境惡劣，她有時仍出入報社，老同事憶及當時的迹孀，來報社教同事以日語唱進步歌曲，在風雨中仍悠然自若。

早年他們住荔枝角九華徑，與黃永玉夫婦為鄰，結為好友。迹孀有日本女性持家美德，後來住在報社隔鄰昌業大廈的時候，迹孀突然帶一隻猴子回家，嚇她一跳。他已不滿足養貓狗，迹孀每日打理頑皮馬騮精無怨言，他喜歡的，她樂於同享。當開門一刻，猴子撲上我身，她看着笑得開心。

那年的大年初四，約傍晚六時，接到迹叔電話，要我速到他家。進屋，夫婦笑臉迎我，說在青龍頭釣到一條二十多斤重的鱸魚，「快吃呀！」這一刻，我感到兩人是何其志趣相投。

隨着人之老去，這些記憶越深。



香港隨筆

張茅